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分析哲學對政治理論研究之影響 以 Quentin Skinner 為例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4-H-034-002-

執行期間：94年01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梁裕康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9 月 8 日

分析哲學對政治理論研究之影響——以 Quentin Skinner 為例

梁裕康

計畫編號：NSC 94-2414-H-034-002

計畫中文摘要

在二十世紀哲學中，一項值得注意的發展，是哲學發展的重心從歐陸（特別是德國）轉移至英國乃至美國的過程，而 Quentin Skinner 正是受到英美語言分析理論所影響的政治思想學者當中成就較為突出的一位。申請人在前一計畫案，指出 Skinner 因為受到 Ludwig Wittgenstein 的 Use Theory of Meaning 與 John Austin 的 Speech-Acts 理論的影響，進一步模糊了語言與行為之間的界線，而將政治理論本身視為一種政治活動，而不僅是一種對政治活動的說明而已。因此 Skinner 開始轉向對修辭（rhetoric）的研究，因為依照這樣的看法，修辭不是一種美化政治人物惡行的說法，而是一種積極而有目的的政治活動。在 Skinner 的理論中，所有的人類行動都可以化約成語言來表現，而這種色彩到了近期的 Skinner 理論中顯得更為突出。當轉向修辭研究時，Skinner 甚至把研究對象從語言更進一步簡化到「概念」（concepts），他所關注的不再是政治哲學家的整套論述觀點那麼大的範圍，而是縮小到關注在其理論中若干關鍵性概念（key concepts）的意義變遷。

雖然這個「修辭學轉向」的確與「語言學轉向」在方法上有著直接的關係。然而這個轉向的結果卻遠超過語言哲學的範疇。如果「修辭學轉向」所討論的是關鍵道德概念的意義變遷，而這樣的意義變遷不僅是語意上的變遷、而是當時社會價值典範的一種變遷（這也就是那些政治哲學家們的意圖），顯然「修辭學轉向」就把 Skinner 的研究從語言方法轉進到倫理研究方法。本研究計畫希望能夠進一步指出 Skinner 的修辭研究方法中所隱含的歷史與倫理學假設，並嘗試去發掘其理論將語言分析與歐陸哲學的連結。

關鍵詞：Quentin Skinner, 修辭, 概念史, 語言行動。

計畫英文摘要

A remarkable development in 20th century philosophy is the emergence of Anglo-Saxon philosophy in place of the dominance of th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German philosophy in particular). And among these influential figures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thought, Quentin Skinner perhaps deserves some attention.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 project, the applicant asserts tha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Ludwig Wittgenstein's use theory of meaning, and John Austin's speech-acts theory, Skinner blurs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action, and treats political theory as some sort of political action rather than the mere description of political action. Hence Skinner turned to rhetoric study. According to this approach, rhetoric is not only the varnish of political vice, but instead some political action with certain positive intention. For Skinner every human action can be reduced to linguistic performance, and this linguistic orientation becomes clearer in his later study. When turning to rhetoric, Skinner reduces his study of language to the study of 'concepts'. What he concerns is no longer the wholesale of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but the changing of meanings of some key concepts in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Although this 'rhetoric turn' is a direct heritage of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outcome of this change is far beyond the realm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If what 'rhetoric turn' deals with is the changing of the meanings of key moral concepts, apparently this kind of change does not only have semantic significance but also a shift of ethical paradigm (and this is what those political theorist intended to achieve). So by doing this, Skinner shifts his study from linguistic analysis to the analysis of moral change. This project wishes to point out the hidden premises, both in historical and ethical terms, in Skinner's rhetoric studies, and to fi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kinner's method of linguistic analysis and th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Keywords: Quentin Skinner, rhetoric, conceptual history, linguistic action.

分析哲學 (analytic philosophy) 是二十世紀以來在西方各國廣為風行的一種哲學思潮，雖然這個哲學運動對政治理論並沒有引起太大的迴響，但是這並不代表分析哲學不能為政治理論帶來啟發。這份研究計畫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考察當代分析哲學的發展，找出其對政治理論研究所可能帶來的一些啟示。本研究計畫認為，分析哲學實際上已經為政治理論研究開創了某些新的面向，例如 Quentin Skinner 根據日常語言分析學派中的「語言—行動」(Speech-Acts) 理論，認為必須對作者的「意圖」(intention) 有所認識，才有可能正確理解其政治思想。

The Analytical Project

雖然分析哲學 (analytical philosophy) 已被公認為二十世紀中最具影響力的哲學風潮，但是對於何謂「分析哲學」卻一直沒有一個清晰的界定。一般而言，分析哲學是指風行於英語世界 (尤其是英國) 的一種做哲學 (philosophize) 的方法，其主要的特徵在於揭露被隱藏在自然或日常語言中的實在 (reality)，以獲致人類知識最終的明確性。Bertrand Russell 曾說「我喜歡確定性的程度，就像人們喜歡宗教信仰那樣」(轉引自高宣揚，1991: 25)，這樣的態度可以說完整地表達出分析哲學的精神。根據這樣的態度，分析哲學所要「分析」的對象並非語言本身，而是語言之後的概念 (concepts) 與命題 (propositions)。而要進行這種分析的工具，則是德國邏輯學者 Gottlob Frege 開始發展出來的古典邏輯 (classical logic)¹ 以及後來所隨之發展出來的各式邏輯系統。這樣的哲學思潮之所以會出現，至少是受到二點影響。首先，是數學基礎的問題。長久以來，數學一直被認為是人類知識的典範，原因在於，用 Kant 的話來說，數學基本上是分析命題所組成，其真假不是由人類的經驗所決定。換句話說，數學理論的真理是必然的。然而，在十九世紀中，這樣的觀點卻開始受到挑戰，原因在於 non-Euclidean geometry (非歐幾何) 的出現。Euclidean geometry 一直是古典數學理論中的典範之一，其論證的方式在於從若干無可懷疑的公設 (axiom) 出發，推演出複雜的幾何證明。然而在十九世紀中，這些原本看似無可懷疑的公設，竟然開始遭到挑戰²。數學界的發展震撼了哲學家們：假使人類最確定的知識——也就是數學——的基礎都被證明有問題，豈不等於是說人類的知識其實都是不穩固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哲學家們開始展開了拯救人類知識的計畫，希望替人類的知識找出一種不可動搖的基礎，而 Frege 正是當中的一員。他的計畫是所謂的邏輯主義 (logicism)：主張邏輯是知識的最底層，因此可以把所有的數學語句翻譯成邏輯語句，並且將所有的數學定理都由邏輯來證明。這樣的見解後來被 Russell 所繼承³。基於這種認知，Frege 發展出現代意義的邏輯系統與理論。另一個影響則是形上學中的實存論 (realism) 與反實存論 (anti-realism) 間的爭議。在十九世紀末期以前，哲學的發展是以德國唯心論 (idealism) 為主流，即使是在英國也是如此。但是自從 George Edward Moore 提出對 Kant 的實踐理性 (practical reason) 把做出判斷所需的心理因素與判斷對象的存在地位混淆在一起的批評之後 (see Moore, 1903)，他更進一步指出哲學問題之所以難解，不是因為問題本身的複雜，而是在於問題的不清晰。一旦把問題的意義澄清之後，問題的解答就會自然的浮現 (see Moore, 1902: Preface)。這樣的看法把英國哲學又帶回到傳統的經驗主義上。

上述二種背景所爭論的問題，在 Russell 那裡第一次獲得了解決。Russell 在他的摹狀詞理論 (Theory of Description) 中，藉著 Frege 所發展出來的謂詞邏輯 (predicate logic)，揭露出某些有疑義的語句 (例如他的經典例子「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old.」) 背後的「邏輯形式」(logical form)，以明白其真正的意義 (Russell, 1905)。這樣的態度後來被 Russell 的學生 Ludwig Wittgenstein 更進一步地發展。雖然在 Wittgenstein 早期的著作中，他

1 Frege 的邏輯體系被二十世紀分析哲學家與邏輯學家們視為典範，故稱之為古典邏輯。而 Aristotle 所發展的 syllogism，則被稱為傳統邏輯 (traditional logic)，現已不再被當代哲學家廣泛運用。

2 問題出在第五條公設：過線外一點若且唯若有一直線與之平行。數學家們發現過線外一點可能有多於一條直線、也可能沒有直線能與之平行。

3 但是在 Russell 指出其理論隱含某種 paradox 之後，Frege 便放棄了這樣的企圖。反倒是 Russell 自己認為可以用集合論 (set theory) 來拯救邏輯主義。但是這樣的計畫最後被 Kurt Gödel 的 incompleteness theorems (不完備定理) 證明失敗。

就已經不認為「哲學的結果不是一堆『哲學命題』，而是要讓命題明晰」（Wittgenstein, 1921: 4.112），但是他在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中所流露出的 isomorphism 與邏輯原子論（logical atomism）卻被某些哲學家奉為圭臬，成為被維也納學派（the Vienna Circle）認為是其所主張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的哲學源頭。對邏輯實證主義者來說，有意義的命題是必須經得起「確證」（verification）的：亦即不僅是必須在經驗上能被驗證的——也就是實證的，更重要的是還必須合乎有效的邏輯形式——如同 Russell 與早期 Wittgenstein 所說的。因為唯有如此命題才能有真正的形上學意義——也就是這樣的命題才是真正指涉世界（refer to the world），而非人的臆想。邏輯實證論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十分巨大，不下於分析哲學對二十世紀哲學影響的程度。特別是在 Alfred Jules Ayer 將邏輯實證論介紹到英國之後（see Ayer, 1936），結果是將英國的哲學研究從「哲學的分析」（philosophical analysis）——即是把分析當作一種重要的做哲學方法——轉變成「分析的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把分析當成檢證哲學研究是否有效的標準（Baldwin, 2001: 6）。在政治學界，受到邏輯實證論的鼓舞，開始興起一股行為主義（behaviorism）的風潮。在這股風潮的最高峰時，甚至出現了「意識型態的終結」與「政治哲學已死」的看法，宣判了不能合乎邏輯分析的命題——也就是政治哲學研究的對象——的死亡。

但是到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美哲學界開始了 Richard Rorty 所稱的「語言的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Rorty, 1967: Introduction）。所謂語言的轉向，指的是哲學研究的重心從邏輯本身轉而把焦點放在對所謂的「日常語言」（ordinary language）的考察。對 Russell 這些傾心於邏輯研究的人來說，語言是透明的，哲學必須要穿透語言去分析語言背後的邏輯形式與內容——最具體的對象就是一個日常語句必須找出其中的命題（proposition），才可能進一步被用來進行邏輯分析。但是這樣的看法後來遭到了懷疑，而這樣的懷疑最早竟然是出自 Wittgenstein——被邏輯實證論者奉為哲學導師的人。後期的 Wittgenstein 開始感覺到邏輯原子論與 isomorphism 似乎行不通，因為世界似乎還有許多東西是無法以這種方式被揭露出來的。因此在他的後期作品中，他逐漸放棄了對邏輯的依賴，轉而把注意力放在對日常語言的用法（use）上。對之前的哲學家——以 Russell 為例——一個語句的意義來自於來自於這個語句所指涉的對象。然而這樣的看法馬上會遭遇一個問題，就是那些不指涉任何具體存在的對象的語句——例如前面提到的「The King of France is bold.」——的意義為何？Russell 的摹狀詞理論正是要解決這類問題的一種嘗試。根據 Russell 的看法，這類沒有指涉對象的語句是假的。但是 Wittgenstein 卻質疑：如果這些語句是假的，何以我們還是可以談論與理解這些句子？他的看法是因為我們都在某種 language game（語言遊戲）中：並不是我們可以去理解這些語句所指涉的對象（如 Russell 所假設），而是因為我們對語言的用法有一定的共識。就好像下象棋時，我們不需要每個棋子「真正」代表的是誰，只要知道這些旗子在象棋規則裡的功能就可以玩了（see Wittgenstein, 1953）。藉著這種方式，Wittgenstein 認為哲學問題之所以產生，並不是因為這些問題觸及什麼形上學的內容，而是使用語言的方式（或者說對語言的理解）出了問題，因此需要的不是「解決」（solve）而是「消除」（dissolve）哲學問題——也就是說不是要給這些所謂的哲學問題找出解答，而是要瞭解這些問題根本不是問題。就好像一個人生病之後，需要的不是增強他的什麼能力，而是要讓他恢復正常一樣，這就何以他說處理所謂的哲學問題就像是給一個治療（therapy）的原因。

這種對語言的考察方式，後來獲得牛津大學一群哲學家——包括 Gilbert Ryle, John Austin, Peter Strawson 還有後來的 Paul Grice——的迴響。其中 Austin 更發展出一套「語言—行為」理論（Speech-Acts）。簡單地說，這個理論認為，一個語句的表達（utterance）包含了三種力量（forces）：locutionary——即該語句字面上的意義（literal meaning），illocutionary——即表達者所欲傳達給接收者的內容，以及 perlocutionary——即接收者所認知到的內容⁴。Austin 更進一步指出，當表達者做出某種表達時，他並不僅是做出某種描述，而是在施行某種行為。以 Strawson 所舉的例子來說，當一個警察對另一個在結冰的湖面上滑冰的人高喊「The ice over there is very thin!」的時候，雖然字面上的意義是「那裡的冰很薄」，可是實際上這個表達真正的意義是那個警察在對滑冰者做出警告。換句話說，表達本身並非對行動的描

4 illocutionary 與 perlocutionary 是 Austin 自創的詞。其中前者指的是「in locution」而後者是「by locution」。

述，而是行動本身。在這種情況下，接收者如果要瞭解一個語句的意義，不能只去瞭解 locutionary 那一面，而必須去瞭解 illocutionary 的那一面——也就是要瞭解表達者到底要藉這個表達做什麼。更進一步來看，若要理解某個表達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顯然就必須去瞭解表達者的意圖（intention）。如此一來，對意義理論的研究，已經從邏輯本身移轉到語言本身。或者換個方式說，哲學的焦點從指涉理論（theory of reference）轉移到了意義理論（theory of meaning）。

邏輯分析與日常語言分析這二種哲學途徑之間的差異，或許可以用 John Searle 某一次的訪談來說明：

這條線索主要是關於意義與真理之間的關係的。在這一傳統中，關鍵的問題是「發語（Utterance）的真理條件是什麼？」屬於這種傳統的哲學家一般都致力確立或決定句子真確的條件，顯而易見，這條線索與科學哲學緊密相聯。另一條線索，……，隨著語言被看做人類行為的一部份，更多地注意語言的使用問題。這條線的關鍵問題不是「意義和真理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而是，「說話者的發語在意義和運用，或者意義和意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是我看到的兩條發展線索（Magee, 1978: 19）。

History as an Argument: Normative Rather Than Descriptive

「意識型態的終結」、「政治哲學之死」等口號的出現，標示了分析哲學對政治理論研究的一次頗具破壞力的高潮。根據邏輯實證論中的邏輯原子論，若一個欲具無法被分析成可以反應世界的邏輯形式，則這個語句不具備任何認知意涵——因為其中沒有真假值（truth value）在內。而不幸的是，傳統意義下的政治理論正是落在這個範疇中。這種見解背後索引含的意義是，所謂的哲學研究的對象必須是那些必然為真的命題，或者說是能反映事實（corresponding to facts）的命題。根據這種看法，可以推論哲學不會是偶然（contingent）的結果。這種看法在當時席捲了學術界，甚至在英國歷史學界中也能找到人呼應，認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從全然不同的事實中推論出真理（truth）。

然而這樣的歷史研究方式也遭到了不少批評。一種批評認為，至少在政治理論的研究中，哲學研究無法與歷史分開，因為哲學研究無法全然獨立於歷史情境之外——也就是說政治哲學在某種程度上會是偶然的。要說明這個論點，這些歷史學者所採用的途徑是從後期維根斯坦以來的角度——即 Searle 所稱的第二種途徑——來從事研究。Kari Palonen 曾提及二位對 Skinner 後來的研究方法有著啟發作用的理論家：Peter Laslett 與 John Pocock。這二位可以說英國在治政治思想史的學者當中，最早注意到這種途徑的一批人之一。Laslett 曾做出「政治哲學已死」的著名宣稱——雖然他自己並不同意這樣的論點。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從對 John Locke 的研究切入。傳統上多半將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視做 Locke 對 1688 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事後的理論化與理性化工作。但是 Laslett 卻把這二本著作的寫作時間推前到光榮革命之前。藉著重新界定這二本作品的完成時間，Laslett 實際上把 Locke 寫作的動機與目的完全反轉過來。因為根據原本的理解，Locke 寫作的目的是為了耙梳光榮革命的理據並且給予某種的證成。然而一旦寫作的時間被提前到光榮革命之前，顯然這樣的目的是不能成立的。那麼 Locke 寫作的目的會是什麼？對 Laslett 而言，長久以來 Two Treatises 被當作是事後理性的沈積，現在在他的筆下卻變成了事前鼓吹革命的行動綱領（Laslett, 1960: 46-7）。更進一步來看，一個看似不甚重要的歷史考據，卻被 Laslett 賦予了較其乍看之下更為重大的意義：政治哲學家不再是 Hegel 筆下的 Owl of Minerva，只有在夜幕低垂之後才開始活動。相反地，他們比較向 Plato 洞穴囚徒之喻中那個偶然看見洞穴以外的世界的人。當他們回到洞穴後，嘗試著說服他的同伴洞穴之外另有天地。像 Two Treatises 這類的作品，正是政治哲學家們用來鼓舞他那些同伴走出洞穴的工具。對 Laslett 來說，政治哲學家不再只是一個旁觀者，他自己就是政治事件中的參與者，而他參與的方式就是發表他的理論或哲學。也就是說，從事政治哲學研究本身不再只是一種回溯或記錄，而是一種行動。Laslett 也因此認為，把政治哲學視為獨立於歷史事件之外的理性建構並不恰當。

相較於 Laslett 把政治哲學全然等同於政治實踐，Pocock 則對政治哲學做出另一種層次的分析。除了 Laslett 所指出的實踐層面之外，Pocock 認為對政治事務的思辨本身就是人類生活中的一種活動，就如同「征戰或耕作或做其他事一樣」（Pocock, 1962: 190）。也就是

說，從事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研究其實包括二種意涵：「研究行動」與「研究思想」二種途徑。前者要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如何幫助我們理解這些思想家們的行為 (如同 Laslett 所做的一般)，後者則是著重如何從一個具體歷史情境中獲致或推出特定的政治理論 (ibid., 194-5)。對 Pocock 而言，一個思想史家所要研究的，是相應的歷史事件與政治哲學間的對應關係。與 Laslett 不同之處在於：Pocock 不只要求驗證政治哲學如何實際引領具體歷史事件的發生，他還認為如何從歷史事件推演出政治哲學、以及推演出怎樣的政治哲學，都是思想史家正當的工作。換句話說，他要研究的是歷史與哲學間雙向的相互關係，而不是邏輯實證論所認為將歷史至於哲學之下、也不是如 Laslett 所認為的將哲學至於歷史之下的研究。

不論 Laslett 與 Pocock 在理論上對 Skinner 發生了多具體的影響，他們二人至少在研究的方向上引領 Skinner 到了一個新的方向。Skinner 隨後也加入了他們從哲學中拯救歷史的行列。然而與他們不同之處，在於一方面 Skinner 並沒有如 Laslett 一樣，把政治哲學視為行動綱領，把歷史抬高到哲學之上。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 Pocock 把思想史研究劃分為「行動」與「思想」二個範疇，而認為這二者間的劃分是不需要的 (Palonen, 2003: 19-20)。因此對 Skinner 來說，(二者間無法完全劃分的) 思想史與政治哲學不再如邏輯實證論所認為的無意義，或者是某些史學家所認為的關於事實與由事實所推演出的結果，而是一種評價式的 (evaluative) 或規範的 (normative) 概念，畢竟政治哲學不能獨立存在於所有的時空當中。若思想史家想理解某個特定的政治哲學，就必須把哲學中評價或規範的那一面——也就是受限於歷史條件的偶然的那一面——加以考量。

雖然可以說這種立場或多或少都反映在 Skinner 的每件作品當中，但是在他從事思想史研究三十餘年以後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看到 Skinner 對傳統歷史研究以及對思想史的偏見所做出的反擊。在他的「The Practice of History and the Cult of the Fact」中，Skinner 所要抨擊的主要對象，是他所接任的劍橋大學現代歷史欽定教授 (Rigius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一職的前任教授 Geoffrey Elton。Elton 認為，首先，由於從事歷史研究時，是歷史學家而非哲學家在對歷史做出解釋，因此哲學在歷史研究中的功能是不存在的 (Skinner, 2002: 11; Elton, 1970: 125, 129, 136, 146)。此外，Elton 認為把歷史哲學當成歷史研究的對象或本質來對待並不恰當，因為歷史研究所要做的是「從全然相異的事實中推演出結論 (consequences)」 (Skinner, 2002: 10; Elton, 1969a: 129)，而這裡所謂的結果指的是真理 (truth) (Skinner, 2002: 12; Elton, 1969a: 68, 86)。依照這種看法，什麼是事實就會決定歷史研究的結果 (即是否能真正找到真理) 的成敗。在這裡 Elton 給了二個指示。首先，無可被懷疑的歷史事實確實存在 (Skinner, 2002: 18; Elton, 1969a: 111)；其次，歷史學者可以界定哪些歷史事實是相關的。這個部分又可以分為二個部分：第一，歷史研究的對象 (亦即其所要發掘事實的歷史對象) 必須是「真正的」或「硬的」歷史——也就是與政府與被統治者的公共生活相關的歷史 (即一般的政治史)。至於其他的歷史研究對象 (例如經濟史或藝術史或思想史)，除了與「真正的」歷史相關，否則不存在研究的價值 (Skinner, 2002: 13; Elton, 1969a: 190, 197, 199)；第二，專業的歷史學家從事歷史研究時，是隨著歷史事實走、根據歷史事實的重要性，而不像那些業餘或玩票的歷史研究者選擇歷史事實來研究 (Skinner, 2002: 15; Elton, 1969a: 31)。不管 Elton 是否直接受到邏輯實證論的影響，他的見解確實非常能迎合邏輯實證論對政治哲學 (對 Skinner 而言這相當於是說思想史) 的攻擊。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以不偏不倚地處理歷史事實的態度，去發掘過去的事實中所隱藏的真理。這是為什麼 Skinner 形容 Elton 的歷史觀耽溺在一種「對事實的狂熱」 (the cult of the fact) 當中。

然而 Skinner 對 Elton 這種狀似合乎科學要求的歷史研究幾乎是全盤的否定。對他而言，Elton 見解可以說沒有一點能被接受。首先，對於歷史研究的目的在於從事實中推演出來的結果這種看法，Skinner 就認為大有問題，因為若要談解釋，只談結論不談原因 (causes) 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Skinner, 2002: 10)。然而一旦要談原因與結論之間的關係，不免就需要把哲學帶入歷史研究中，因此 Elton 認為歷史研究可以不談哲學是行不通的說法。再者，是否真的存在無可懷疑的歷史事實，以及歷史學者是否真能毫無問題的去認定這些歷史事實呢？Skinner 的答案是否定的，而且否定這二點的理由是一樣的。Skinner 用了一個 Elton 不會認

可的方法所得到的答案來否定所謂「真正的」歷史存在，他認為這是傳統英國大學教育與政治菁英教育高度相關的結果。一旦這種聯繫被鬆綁，政治史的重要性自然也會大幅降低（Skinner, 2002: 23）。更重要的是，關於一個歷史學家所要研究的問題，可能有無限多的歷史事實存在（讓我們先假設真的有歷史事實這種東西），光要決定哪些歷史事實是必須被採用的本身就是一種選擇，而不是像 Elton 所假設的相關的歷史事實會自動引導歷史學者前進。除非研究者自己先界定要研究的目的，否則光是有關歷史事實的取捨就是一個無窮盡的工作（Skinner, 2002: 16-20）。因此結論是，歷史研究並沒有辦法如 Elton 所說的讓事實來引導客觀的研究。

如果，如 Skinner 所說，歷史研究無法擺脫哲學，而哲學研究，如 Laslett 與 Pocock 所說，也無法擺脫歷史，那麼如何進行歷史研究才是合理的方法呢？對於這個問題，Skinner 發展出自己的一套觀點。

Intention and Convention

既然對 Elton 的事實取向歷史研究方法有所質疑，Skinner 就提出另一種研究途徑。值得一提的是，Skinner 所反對的研究途徑顯然是受到分析哲學（尤其時邏輯實證論）有相當的親近性，但是他自己所推崇的研究途徑卻也同樣得到分析哲學的啟發。Elton 所跟隨的是 Searle 所指出的第一種方向，而 Skinner 所跟隨的則是第二種方向⁵。然而對 Skinner 而言，他確實反對第一種途徑獨大的情況。尤有甚者，他甚至更進一步地認為在思想史或政治哲學的研究裡，第一種途徑是不適當的方法。換句話說，對 Skinner 而言，或許有些題材是適合第一種途徑的，甚至有些可能同時可以包含二種途徑，但是卻也有些對象只適合第二種途徑。顯然 Skinner 就認為政治哲學屬於這一類題材。他之所以做出這樣的論斷，可以說是出自於對「行動」（action）這個概念的解釋。

Skinner 指出當從事歷史研究時，研究者所遭遇的問題是到底研究對象（在思想史研究中指的是文本）的意義是什麼。他根據「語言—行動」理論，把日常語言（ordinary language）中的三種分析層次運用到歷史資料上：字面上的意義是什麼？對我（即讀者）而言，文本指的是什麼？以及作者想藉這個文本指什麼（Skinner, 1972b: 396-7）？這個區分顯然與 Austin 的 locutionary, perlocutionary 以及 illocutionary forces 的分類完全一致。Skinner 與 Austin 一樣——更進一步指出，他把他的研究重心放在第三種意義上。在「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1969）一文中，Skinner 把「語言—行動」理論運用在思想史研究的嘗試開始獲得廣泛注意。他在此文中指出了「文本主義」（textualism）⁶的問題，認為只求瞭解文本本身的意涵是不充分的，因為除了要瞭解文本作者說了些什麼以外，歷史學者還需要瞭解作者藉由說這些東西要做什麼（Skinner, 1969: 31）？也就是說，歷史研究除了要瞭解文本的內容（what is the content?）之外，還必須要瞭解文本的作用或目的（what is the text for?），或者用 Skinner 自己的話來說，我們必須瞭解這些文本是要幹嘛用的（what point is it?）（ibid., 31）。

Palonen 指出後期 Skinner 認為意義的理解不只是文本內容而已，還涉及到了文本如何以及為何被以某種特定行事來表現（how and why it is said）。更重要的是，後者是前者的先決條件：若不知道文本為何以及如何表現，那麼就無法理解文本的內容是什麼（Palonen, 2003: 32）。對照 Skinner 後來轉向強調修辭（rhetoric）來看，這樣的見解其實是合理的，事實上等於是為他後來的轉向奠基。畢竟文本如何與為何被以某種特定來表現顯然與語言的使用方式——修辭學裡的主題之一——有密切的關係。

然而這個轉變並不突然。在 Skinner 較早期的作品中就能發現若干端倪。做重要的線索，應該可說是他對「常規」（convention）與「意圖」（intention）——分別處理 how 與 why 的問題——的一貫重視。雖然這些問題在 Austin 的理論中就已經十分被重視，但是 Skinner 卻借來分析歷史現象，使得這點也成為他的研究方法中與語言分析最清晰的關連之一。在

5 當然，這裡並不意味著在哲學研究中二種途徑是針鋒相對的。事實上二者只不過是不同的研究取向而已，不必然具有任何的競爭關係。

6 但在稍後的修訂版（2002）中，因為 Skinner 認為 textualism 這個詞會造成若干混淆，所以不再繼續使用這個詞。

「Conven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1970)一文中，Skinner 希望能夠對 Austin 的理論中若干未決的問題做出補充。Skinner 認為 Austin 雖然指出除了 locutionary force 以外，日常語言還同時帶有 illocutionary 與 perlocutionary forces。然而 (i) 他卻沒有對後二者間的區別做出比較細緻的分析，而且 (ii) 他也沒有說明要如何去「理解」(uptake) 日常語言中 illocutionary force 的條件。對於這些問題，Skinner 嘗試做出回應。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可說都是純粹語言分析哲學的討論。一直要到文章後斷，Skinner 才提及這些討論對歷史學者的影響。

事實上對 Austin 理論中這些闕漏之處，並不是沒有被其他人所注意到。例如另一位語言哲學家 Peter Strawson 就指出一個受話者 A 要理解說話者 S 的發語 (utterance) 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 的 (至少是必要) 條件就是 S 必須能提供某種「本質上可被表達出來的」(essentially avowable) 的意圖⁷。根據這樣的標準，Strawson 提出二種理解 illocutionary force 的溝通型態：一是 A 理解那些去解釋 (decode) S 的「本質上可被表達出來」的意圖所需要的常規，而這也是 Austin 理論中所認可的；另一種則是有些 illocutionary force 是不需要經過常規過濾，A 就可以直接「理解」S 的意圖 (see Strawson, 1964)。

然而 Skinner 對 Strawson 的分析卻不甚贊同，並且提出二種狀況來反駁。第一種是所謂「閃爍其辭」(oblique) 的狀況，意即雖然 S 的「本質上可被表達出來」的意圖存在，但是真正把這種意圖表達出來的結果，無助於 A「理解」S 的發語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另一種是「不能表達出來」(non-avowable) 的狀況。在這種狀況下，雖然 S 的「本質上可以被表達出來」的意圖存在，但是不能被公開表達。因為一旦這麼最，反而會破壞原本發語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 (Skinner, 1970: 122-3)。舉例來說，前者如一個聽不懂笑話的人問說笑話的人到底哪裡好笑。「哪裡好笑」當然可以解釋，但是經過解釋之後，原本說笑話的目的就喪失了 (這種「笑話」還讓人覺得好笑嗎？)；後者 (如 Skinner 自己給的例子) 像是諂媚 (flattering)。若說話者對他所奉承的對象明示他的所作所為是為了拍他馬屁，那麼等於是在破壞這個行為本身 (因為實際上這樣會激怒對方)，反而引起反效果。或許這二種行為並不如 Skinner 自己所認為地可以被清楚劃分，但是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種類的狀況的確不是 Strawson 所能解釋的，因為就這些例子來看，其實是需要某些東西來輔助，才能掌握到那些「本質上可被表達出來」的意圖所展現的 illocutionary force。因為 S 的意圖在可被表達卻沒有被表達出來的情況下，A 是不可能直接去「理解」的 (Skinner, 1970: 29-30)。Skinner 指出，以諂媚的狀況為例，一次成功的溝通必須在 A 與 S 都同時認知到雙方都在一種特殊的情境中，否則他們會連要溝通什麼都不知道⁸。這種觀點應該是源自 Ludwig Wittgenstein 的「語言—遊戲」(language-game) 概念 (see Wittgenstein, 1958)，然而 Skinner 卻為這種概念加入了某些社會建構的色彩，因為他認為辨別每種遊戲的規則的能力來自常規 (Skinner, 1970: 130-1)⁹。

在這些純粹語言哲學的討論之後，Skinner 回過頭來討論這些理論對歷史研究的意義所在。既然常規是理解語言行動時不可少的關鍵，而歷史文本又是語言行動的一種表現，那麼歷史學者必然需要理解他所研究的對象所浸淫的常規為何。¹⁰然而這種理解是否可能？

7 意思是說這種意圖並未被實際表達出來。因為一旦被實際表達出來，這種 force 就不再是 illocutionary 而是 locutionary 了。比如說 A 問 B「瑪麗漂不漂亮？」B 回答「她個性很好。」雖然 B 並沒有直接回答 A 的問題，但是顯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意即 B 真正的意思是瑪麗不漂亮)。這個真正的意圖雖然沒有被 B 公開表達出來，但是不可否認其具有被公開表達的可能性。

8 比如說 S 對 A 指著一張白紙，那麼到底 S 要表達什麼？A 又能從這個行為中「理解」什麼？到底 S 要表達的是有「一」張白紙 (指數量)、有一張「白」紙 (指顏色)、還是有一張白「紙」 (指性質)？除非雙方已經預先對這點有共識 (agreement)，否則 S 的意圖根本不可能為 A 所探知。

9 而這點與 Wittgenstein 的原意似乎有些出入。Wittgenstein 用「協議」(agreement) 來形容這種達成共識的過程，雖然這個字有些誤導的作用，因為這個字的字義似乎暗示著達成協議是一種志願的 (voluntary) 的過程，但是 Wittgenstein 並不這麼認為。相反地他認為人們是「盲目地」(blindly) 遵守規則 (Wittgenstein, 1958: Remarks 219)。

10 Skinner 借用日常語言分析方法來從事歷史分析，其中有一個問題，就是二種研究途徑的研究對象不同。前者研究的是日常語言中的語句 (sentence) 而後者研究的則是文本，二者顯然有著範疇上 (categorical) 的差異。換句話說，Skinner 必須要解釋何以能夠把研究語句的方法應用到分析文本上。要彌補這個理論上的

Skinner 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並以「無意中聽見」(overhear) 的例子來說明。當 S 對 A 施行一項 illocutionary force 時，被一個第三者 N (意即 S 與 A 以外的人) 偶然聽見。雖然 N 不是這場對話中的對話者，但是 N 仍可能瞭解這個 force (Skinner, 1970: 134)。這個例子說明了跨時期或者同時期的異文化的理解，在某種程度上仍是可能的，只要能夠掌握控制研究對象的常規。歷史學者的工作，正是要從事這個方面的解釋。

這種高度重視常規的看法，讓 Skinner 被很多人認為是一種社會建構論 (social constructivism)。因為既然常規是規範受話者是否能「理解」illocutionary force 的必要條件，那麼把語言行動視為是常規的產物、或是被常規所決定的結果，似乎不是太不合理的推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Skinner 自己卻明白地反對這種說法 (Skinner, 1969a: 43)。對於這個問題，或許 Skinner 對意圖的看法，可以說明何以他會採取反對的態度。

在「On Performing and Explaining Linguistic Actions」(1971) 一文中，Skinner 說明了語言—行動與意圖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解釋語言—行動這二個問題。首先，Skinner 先問若語言—行動是一種志願的行動 (voluntary action)，那麼語言—行動與其他的一般志願性行動的差異在哪裡？根據當時行動哲學的看法是：當一個狀況可以被語言以「A bringing it about that P」(「A 引發了 P」) 的形式所重述 (redescribe) 時，其中 A 是此一狀況中的行動者 (agent)，P 是 A 所做的一個行動 ϕ 所獲得的結果 (result)，而 ϕ 是重述此一狀況的語句中的動詞所代表的行為。在這裡 ϕ 是「A 在做什麼？」(what is A doing?) 這個問題的答案 (Skinner, 1971: 3)。當然 ϕ -ing 必須要符合若干條件，重述的語句才能符合原來的狀況。Skinner 首先要挑戰的，正是這些條件是否真的有效。他的基本觀點是：有些 illocutionary act 是有效的志願行為，但卻不能被上述的重述形式所包含在內 (Skinner, 1971: 4-12)。這個問題之所以會產生，正是因為一個語句中常會包含一些 (用 H. P. Grice 的話來說)「非自然的」(non-natural) 意義¹¹。更重要的是，若一個行動的定義 (如前面提及的重述行為的語言形式之中) 包含了受話者的某些事態的改變，而且若受話者的事態的改變是由「非自然」意義所引起的，那麼我們將很難判斷這會是說話者偶然或者不經意 (*per accidens*) 的舉措，除非這樣的 illocutionary act 是一種意向性 (intentional) 的—意即指向某事態的一行為 (Skinner, 1971: 8)。除此之外，Skinner 還特別指出，A 的 ϕ -ing 與是否「A bringing it about that P」其實不必然以語言重述一個 (illocutionary) 狀況的必要條件，因為可能會有某些 illocutionary act 是包含前者卻不含後者，或者包含後者卻不含前者的情況 (Skinner, 1971: 4-11)。綜合這些分析，Skinner 得到的結論是一些 (illocutionary) 的狀況是可能被有效的重述語言所表達，而且這些狀況中的行為必然是意向性的 (Skinner, 1971: 13)。

除此之外，他更進一步指出，對一個狀態的重述等於是把此一狀態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 揭露出來，而這樣做就不僅是重述該狀況而已，而是對該狀況的一種解釋。解釋的意思不是去說明到底說話者做了什麼，而是說明為什麼說話者要做這種行為。然而這樣的解釋不是一種因果關係 (causal) 的探索，而是對意圖的瞭解 (Skinner, 1971: 13)。在探討過這些純粹語言哲學上的問題後，Skinner 回過頭來指出，從事歷史研究也是一樣，若只關注在文本上，就好像只找尋語言行為 (特別是「非自然」意義) 中 (不存在的) 因果關係，而忽略掉在其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 要去瞭解這些 illocutionary force，讀者等於是去瞭解其中說話者的意圖。而要瞭解這些意圖，則必須掌握說話者所運用的常規。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理解可以 Skinner 不承認他是一個社會建構論者的原因，因為一個語言—行為的發動主要還是依賴發話者個人的意圖，而不是被他所處的常規所規範。常規或許會限制發話者表達其語言行動的方式與內容，但是常規本身並不能發動一個語言—行動，只有發話者本身基於其特別

差距，Skinner 勢必需要將「語言—行動」理論從語言分析的層面轉換成為行動哲學 (philosophy of action)。針對這個轉折，Skinner 在對意圖作分析 (本文稍後處) 時會提出說明。

11 根據 Grice 的說法，一個語句的「非自然的」意義 x 是指「x 意指 p 而且 x 意指 p 沒有引起 p」(x means that p and x means that p do not entail p)。用他自己舉的例子來說，比如「(公車上的) 鈴聲三響表示『這班車客滿』」，但是公車司機也有可能搖錯鈴，在客滿時不搖或沒客滿時卻搖了鈴。因此三響鈴聲與客滿之間的關係並非該語句所說的那麼必然，而是有可能不照著發生 (things could be otherwise)。這種情況被 Grice 稱為「非自然」的意義 (Grice, 1957: 378)。

的意圖時才可能。因此常規充其量只是理解發話者意圖時所需的意義的地平線（meaning of horizon），Polanen 也因此認為 Skinner 的語言—行動觀其實是把行為者從行為主義中的結構—功能論中所拯救出來（Polanen, 2003: 33）。藉由將行為者的意圖與常規連結，Skinner 把用來分析日常語言的語言—行動理論轉化為一種行動哲學，因為他把語言—行動的分析裡的發話者做出發出某種語句的動機轉化為發話者採取某種行動的動機，而這個轉化的關鍵就是 Skinner 把文本的寫作類比為個別語句的發生，都是出自於某種意圖所致。而且更因為如此，所謂解釋語言—行動的意義就不僅是追尋不同行動之間的因果關係，而是要解釋意圖與語言—行動之間的關係。

From Truth to Rhetoric

大約從 70 年代末期開始，Skinner 的研究對象逐漸轉變，由原本的語言—行動分析的哲學討論過渡到對修辭（rhetoric）的研究。這個轉變讓他的理論浮現出二個清楚的階段：從強調政治哲學的歷史成分到強調政治哲學的語言呈現，而後者更是後期 Skinner 理論中一個主要的研究取向。

在討論這二個階段到底是延續或斷裂的發展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轉變何以會發生，以及何以會以這樣的方式出現？對這個問題，或許可以跟 Skinner 對「真理」（truth）這個概念的理解有關。從上一節的討論可以發現，藉由語言—行動的分析，Skinner 認為對政治哲學的研究必然要併入歷史的條件中，意即政治哲學必然在某種意義下會是思想史的研究。這樣的看法所隱含的一種觀點是：政治哲學所揭露的「真理」（如果有的話）必然是 contingent 且 context-dependent 的。但是如果「真理」是這樣性質的概念，那麼「真理」將不再是真理，畢竟真理，按其定義，必然是普遍（universal）的。

但是這樣的看法遺留下一個問題：若使一個政治哲學產生效力（validity）的真理是暫訂（甚至是不確定）的話，那麼此一政治哲學的效力顯然有問題，意即人們沒有必然要接受此一政治哲學的理由。若是這樣的話，以這種「真理」為基礎的政治哲學充其量不過是野心家耍嘴皮子的結果，不具任何嚴肅意義。更嚴重的是，政治哲學可能更等而下之，因為活躍的政治哲學常是被政客用來修飾其惡行的謊言而已。對於這個問題，Charles Taylor 可能是對 Skinner 提出最清楚質疑的人。他指出在 Skinner 的理論中，歷史學者對政治哲學所做出的判斷似乎與其中的真理或有效性無關。他認為這種把「把真理問題括號起來」（bracketing the question of truth）是不可能的，歷史學者必然也要持有某種真理，才可能做出判斷（Taylor, 1988: 219-20）。

如同在前面曾指出的，Skinner 的研究所強調的不是什麼真理或者真裡的內容或真值條件，而是語言或政治哲學如何被理解或使用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不是到底真理的內容是什麼，而是「真理」這個概念如何被理解與運用的問題。根據這樣的認知，他不同意如 Taylor 等人所提出的批評。他指出，如果對政治思想所進行的歷史分析，如果要考慮真理問題的話，通常是根據二種理由。一是必需要假設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即政治哲學的內容）中的（至少是）構成部分為真，否則我們將無法理解到底其內容為何（Skinner, 2002: 29）。Skinner 主出，這樣的說法當然有道理，但是 Taylor 這些人似乎對這個原則過度推論了。因為同意這點並不表示其內容「必須（實際上）為真」時我們才能理解。他舉了 Jean Bodin 對女巫（witches）的信仰為例，即使我們今天都不認為女巫是一個真的概念，這也不會妨礙我們理解 Bodin 如何去談論女巫這個概念。換句話說，在談論這些政治哲學時，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協議」（agreement）而不是對真理的認可（endorcement）（Skinner, 2002: 30）。Skinner 關於這點的見解與 Wittgenstein 所舉的甲蟲的例子有異曲同工之妙（see, Wittgenstein, 1958: Remarks 293）。

第二個反對「把真理問題括號起來」的看法，是出自一種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觀點，就是假的信念（false beliefs）意味著理性的失靈，因此需要進一步地解釋（Skinner, 2002: 30）。根據這種觀點，只要真理只需要被標示出來，而不需要進一步解釋為什麼我們會把這些東西視為真理。舉例來說，有一張椅子在 A 跟 B 兩人面前，A（正確地）指出那是一張椅子，而 B 卻誤認為那是一張桌子。在這種情況中，A 不需要解釋「為什麼」他說那是

一張桌子，意即只出示時本身已經是充分的理由，而不需進一步的解釋（further explanation），但是B卻需要解釋為什麼他會把椅子誤認成桌子。Skinner認為，只有根據這樣的看法才能瞭解何以Taylor等人為什麼會堅持不能「把真理括號起來」，因為這樣才能之道什麼東西是需要被解釋的：對歷史學家而言，那些假的概念就是他們所要解釋的對象，而所要解釋的問題則是他們為什麼會犯這種錯。

Skinner卻認為這樣的看法似乎搞錯了問題的本質。根據這樣的看法，歷史學家所要解釋的對象等於是去解釋理性的喪失（lapse of rationality）——亦即何以行為者（agent）不能：第一是這等於要先預設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真理，只不過問題發生在行為者無法認識此一真理。換句話說，這不是本體論的而是認識論的問題。然而這樣的說法有二個問題，第一是這必須預設有一個客觀存在的真理，但是往往這裡所謂的真理都只是做解釋的歷史學家自己所認定的「真理」，而非當時的行為者所認識的「真理」，更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客觀存在的真理。如此一來，歷史學家就會犯下所謂的「地域主義」（parochialism）式的謬誤：以自己的見識去推測別人的見識，一個Skinner認為唯有採取語言—行動分析才得以避免的謬誤。另一個問題是，這樣做等於把理性這個概念非歷史化。按照這樣的看法，歷史學家往往不能理解為什麼相信一些（對他們而言看似）假的概念也能被解釋為理性的行為。這裡Skinner採取一種反理性主義的論證——特別是David Bloor所提出的「Strong Programme」，認為所謂真的概念與假的概念都同樣需要解釋，也救是Bloor所謂的「無差別」（Impartiality）原則（Skinner, 2002: 34; cf. Bloor, 1991: Ch. 1）。這種看法直接反對理性主義的觀點，因為其不認為真的理論並不優於假的理論，因此同樣需要進一步解釋。但是在另一方面，Skinner卻反對Bloor所提出的另一項「對等」（symmetry）原則——同樣的原因（cause）可以被同時用來解釋真與假的信念。他認為這種這個原則忽略了行為者之所以會視某種信念為真必然是出自某種理由、而非盲目或任意的選擇。「對等」原則意味著對行為者行動的理由（也就是在語言—分析行動中所強調的意圖）的忽略（Skinner, 2002: 34-5; cf. Bloor, 1991: Ch. 1）。從這點來看，可以再次理解為何Skinner聲稱自己不是相對主義者。

如果政治哲學的研究與理性跟真理無關——至少不是以邏輯實證論式的方式相關，而是跟語言—行動有關的話，顯然一個比較恰當的研究途徑必須回到對語言—行動本身的分析。在這樣的意義下，Skinner把研究的焦點逐漸轉移到修辭（rhetoric）上。

根據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的定義，「修辭」一詞指的是「運用語言來說服或影響別人的藝術」（the art of using language so as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others）。這個定義裡有二點與Skinner的語言—行動分析有相符之處。一是這個定義明確指出修辭是一種意向性的行為：目的是要說服或影響他人；第二是完成此意圖的工具是語言。這些特徵都說明了修辭為何被Skinner視為一種恰當的研究標的。除此之外，Skinner還進一步論證了何以修辭與歷史研究有關。他以二個階段來說明這個過程。首先，他指出任一種政治哲學的目的都是意向性的——即是要改變或強化社會現有的規範（norms），因此歷史學者所要關注的是政治哲學當中所倡議的道德原則（moral principles）。而要研究這些道德原則的變遷，就等於是要去研究代表這些道德原則的語彙所表達的語意的變遷。其次，Skinner進一步指出，這些語彙不僅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更是評價性的（appraisive）。至於要如何分析這些語彙，則包含了此語彙在三個層面上的語意變遷：（i）使用這個（代表某種概念的）語彙的判準（criteria）；（ii）要知道這個語彙的指涉物（reference）是什麼。在這裡Skinner給指涉物一個異於一般哲學上使用的原意，轉而指稱理解如何正確地根據判準來使用一個語彙（a consequence of understanding the criteria for applying it correctly）；（iii）要瞭解使用這個語彙所要正確表現出的評價性態度是什麼（Skinner, 2002: 161-2）。以「有勇氣的」（courageous）一詞為例，要分析這個概念，必須包括（i）其判準包括例如一次有勇氣的行為必須是志願的行動，必須發生在某種危險的情境中等等；（ii）要能分辨例如形容不怕痛是有勇氣的行為是不恰當的，因為這個行為可能不是發生在一個危險的情境中；（iii）要知道用「有勇氣」來形容某個行動其實帶有某些讚許而非譴責的意味。對Skinner來說，所謂的修辭研究，可以說就是針對所要研究的政治哲學當中代表其核心道德原則所運用的詞彙進行以上三個層面的語意分析。

Skinner 認為，許多歷史學者都認為政治哲學通常是政客用來事後合理化（*ex post facto* rationalisation）其惡行的詭辯。因此就政治哲學本身（*per se*）而言其實是不關緊要的。唯一例外的狀況是除非政治哲學中的道德原則是這些政客行動的動機（*motive*）——一種顯然絕無僅有的狀況。這個政治哲學無用論的指控與前面提到 Taylor 反對「把真理問題括號起來」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 Skinner 卻透過一套複雜的修辭分析，指出政治哲學（尤其是當中的道德原則語彙）即使不是政治人物行動的動機，也具備某一種值得歷史學者注意的功能，就是這些語彙具備被用來合法化（*legitimate*）其所作所為的目的。因此從這些語彙的語意變遷過程與結果，歷史學者就可以知道這些政治人物是否成功地讓當時的社會接受他們的行為。在這種語言—行動的修辭分析裡，正應驗了 Wittgenstein 所說的「言語就是行為」（*Words are deeds*）（Wittgenstein, 1984: 46）。

結論—分析哲學對 Skinner 的影響

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是二十世紀以來在西方各國廣為風行的一種哲學思潮，然而這個哲學運動對政治理論並沒有引起太大的迴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可能是因為分析哲學本身並沒有一個很清楚而系統的理论，導致政治理論家很難加以應用；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因為在論及價值問題時，分析哲學通常是進行後設倫理學的分析——即分析哲學感興趣的問題不是 *what is good?* 而是 *what makes good?*。這種原因使得政治理論研究者與分析哲學家之間始終存在一些距離，例如邏輯實證論者藉由分析哲學的理论（例如對早期 Wittgenstein 的選擇性詮釋），將倫理學等不具認知意義的命題排除在科學之外，接著政治學者又從邏輯實證論獲得啟示，發展出只對具認知意義命題進行分析的行為主義，而更進一步做出政治理論以死的宣稱。這可能是在二十世紀中分析哲學對政治理論研究最大的影響。

然而分析哲學對政治理論並非只有上述的負面影響。隨著分析哲學本身的發展，政治理論也獲得了再評估的機會。例如邏輯實證論戲劇性地被其所標榜的奠基者 Wittgenstein 的後期理論否定之後，政治理論與哲學似乎又重新獲得學界的重視，而這些分析哲學中的新發展，確實也成為某些政治理論重建的現成基礎，例如 Richard Rorty（1979 and 1989）與 John Gray（1989 and 2000）不約而同地對自由主義的知識基礎進行考察。他們都從後設倫理學的角度切入，探討自由主義的倫理基礎是什麼。這種研究方法與傳統自由主義研究最大的差別之一，在於傳統研究多從某些倫理學假設出發，例如 Locke 的自然權利、Kant 的自主性等，藉以作為其自由主義論證的基礎與出發點。但是像 Rorty 與 Gray 這類的研究者並不熱中於尋找出這類的基礎，反倒是轉而考察這些基礎是不是真的存在。簡單地說，他們對自由主義的一大貢獻，在於提供了一套不訴諸倫理基礎的證成方式：我們之所以接受自由主義並不是我們應該（*ought to*）接受自由主義，而是因為我們在知識上必須（*have to*）接受自由主義。舉個例子來說明這點：我們不應該亂丟紙屑，原因並不是亂丟紙屑是缺乏公德心的行為，而是因為亂丟紙屑會破壞環境衛生，進而影響我們自己的身體健康。從這樣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分析哲學對規範性理論的影響：分析哲學讓政治理論研究關注的焦點，從理論的道德基礎轉向道德知識論。從這個角度來看，分析哲學算是開啟了另一種從事政治理論研究的新途徑。

在當代政治理論研究中，另一個受到分析哲學影響的理論家，則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對象是 Skinner。後期 Wittgenstein 轉向考察日常語言取代早期建立一種精確人工語言的理想，這時他放棄了自己早期所認為能以邏輯結構精確反應（*picture*）世界的看法，取而代之的是一般日常語言的「意義即用法」的觀點。這種看法認為一個詞意義的來源並非來自其反映（*present*）了指涉物，而是反映在使用者對這個詞的用法之中。稍後的牛津哲學家例如 Gilbert Ryle 與 John Austin 則進一步提出了「語言—行動」（*speech-acts*）理論，指出意義即使用中所謂的「使用」必然是一個具意向性（*intentional*）的行動，否則語言中的意義將是任意而無法理解的。Skinner 則是繼承了這套「語言—行動」觀，強調政治理論的考察不僅需注意其文本中字面上的含意，更需要將作者寫作時用字淺詞背後的意圖一併考量，否則研究者必然會誤解作品的原意。

從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分析哲學對當代政治理論研究的不同影響。第一是對政治理

論的研究而言，分析哲學由一種消極的角色轉而成為積極的角色，亦即分析哲學之於政治理論已從邏輯實證論的破壞性角色變成一種有效的工具；第二、政治學的研究似乎有必要重新檢視一些不具認知意義的命題，例如 Skinner 所強調的意圖，因為即使有些東西雖然不具備認知意義，但卻是政治生活的一部份，政治理論家可能無法對這部分棄而不顧。也就是說，政治理論家似乎應該重新審視政治學所應含括的研究範圍。

從某個角度而言，Skinner 的理論正是運用了分析哲學的途徑為政治理論研究拓展了新的方向。當他把意圖這種主觀的概念視為研究對象時，他等於宣示將非命題式的 (non-propositional) 的意義帶進政治理論的研究中，並且將其視為政治生活裡的一環。這點可用底下二個例子來說明：「桌上有個茶杯」跟「這幅畫很美」。前者是一個具認知意涵的命題，因為此命題的對錯具有某些可被所有人接受的判斷標準，亦即這是一個帶有真假值的有效命題。但是後者卻缺乏這層公共判斷的標準，因此毫無對錯可言，這類的句子就是非命題式的語句，而意圖顯然屬於後者。

Skinner 雖然肯定了政治理論中這層非認知意義的存在，但是他並沒有更進一步去追究這層意義與政治理論中所需的規範性 (normativity) 間的關係，亦即到底如何以行為者的意圖去證成某一種的政治行為。在 Skinner 的理論中，規範性的來源似乎被認為是哲學家的的工作。但是對政治理論的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遲早都必須面臨的問題，畢竟政治理論最終都必須說明其是可以在道德上被證成的。如果是這樣，接下來的問題是分析哲學提供了怎樣的倫理觀點可供政治理論參考？對於這個問題，不妨再以 Skinner 的理論作為討論的出發點。Skinner 似乎沒有直接去討論這點，因為這不是歷史學者的問題。但是他也曾約略提到：Austin 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定見，因為有時候他似乎認為常規 (convention) 而非意圖才是語言—行動中意義的來源。這個爭論也發生在對 Wittgenstein 「意義即使用」的詮釋中。但是不論如何，在論及分析哲學與政治理論間的關係時，這是一個必須被克服的問題，否則我們將無法知道要如何去證成任何一種政治理論。

對於這個問題，Skinner 的理論似乎是建議一個語言行動（或者用 Austin 的話來說，*illocutionary act*）與意圖有關，而意圖也不是憑空而來的，其帶有很大的社會建構成分。換句話說，語言行動、意圖以及常規間必定以某種關係連結在一起。基於這樣的判斷，Skinner 認為，當我們在進行政治思想研究時，如果只就文本進行研究，那麼最多我們只能夠回答 *what* 跟 *how* 的問題：亦即政治思想家們到底提出了什麼樣的意見，以及他們怎樣去論證他們的看法。然而，如同文中所提及，Skinner 本人卻明白反對這種社會建構論的說法。或許對他來說，他認為這不是歷史學家而是哲學家的的工作，但是無論如何到底行為者的意圖的成因與內容卻因此成為 Skinner 理論中一個有待解釋的項目。對於另一個更為根本關於 *why* 的問題，亦即政治思想家們為什麼要提出某種特定的看法，Skinner 這樣模擬兩可的態度顯然無濟於事。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這點是語言行動中的動機問題。簡單的說，要充分理解一個思想家的看法，必須要知道他到底為什麼提出某些特殊意見。而要瞭解這點，則必須從瞭解他寫作的意圖著手。但是因為意圖跟常規之間有某種連結，因此對政治思想的研究必須超越文本本身的範圍，還必須對文本以外的脈絡有所理解，否則我們將無法掌握其意圖的內涵。因為這些看法，使 Skinner 常被歸類為相對主義者或者歷史主義者—即使他自己不同意這點。

然而 Skinner 所提出的這幅基本圖像中，卻有若干疑點值得進一步推敲。在方法上，至少有以下二個方面。首先，即使我們承認 *illocutionary act* 是一種對意義的有效看法，但是怎樣的語言行動才是有效的卻很難認定，因為可能有些 *illocutionary act* 並不具備意圖在內就會發生，而有意圖的行為似乎也未必會是 *illocutionary act* (Graham, 1988: 153-4)。雖然 Skinner 自己認為這種看法把 *illocutionary act* 與 *illocutionary force* 混淆，因而將沒有透過實際發生的 *illocutionary act* 所表達出來的 *illocutionary force* 當作是不具備意圖的 *illocutionary act* 所致 (Skinner, 1988: 265-6)。然而另一個更明顯的問題在於：到底語言行動理論是否真能如 Skinner 所說的回答有關 *why* 的問題？或者換句話說，所謂回答有關 *why* 的問題，到底是指對語言行動所展現出來的力量或特質的解釋，還是語言行動的成因？如同 Martin Hollis 與 Graham 也質疑的，Skinner 的理論所解釋的似乎只含前者而不含後者。對於後者的解釋，似

乎要靠行為者的動機 (motive) 而非其意圖才有可能 (Hollis, 1988: 139-146; Graham: 1988: 154)。雖然 Skinner 宣稱這樣的解釋是成立的，只不過這樣的解釋不是「因果」的解釋，暗示著若要「因果」的解釋則確實必須訴諸行為者的動機 (Skinner, 1988: 266-7; cf. 1972a)。然而這樣的說法似乎有含糊之處，因為即使 Skinner 的辯解能成立 (意即這是一種非因果式的解釋)，他也必須說明為什麼政治哲學的研究需要的是這種非因果式的解釋。對於這二個問題，似乎有作更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Skinner 的理論的重要性，在於他將二十世紀哲學中的新進展應用到政治思想的研究，從而為政治思想的研究拓展出一些新的視野。以他對霍布斯的研究為例，若干學者在對 *Leviathan* 分析中，竟然可以得出霍布斯是本務論 (deontology) 的結論，Skinner 對此曾為文批判。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近乎臆想的結論，是因為研究者只追求在文本中的一致性，而忽略了文本與語境脈絡間的關係所致。然而除了這個比較技術性的問題之外，Skinner 對當代政治理論研究更重要的啟發，應該在於對何謂「理解」(understanding) 與「意義」(meaning) 提出了更周延的一種看法。這些議題都是二十世紀分析哲學中的重大議題與貢獻，Skinner 身處在分析哲學的重鎮劍橋大學中，受此見解影響自然不足為奇。到近期 Skinner 甚至更進一步地走向揚棄哲學轉向修辭 (rhetoric) 一途，更是受此一哲學風潮影響的明證。而這樣的態度也與若干政治哲學家殊途同歸，例如 Richard Rorty 的「民主先於哲學」或 John Gray 的自由主義討論等。另外在史學研究上，Skinner 也開創了所謂的 intellectual history 的研究途徑，強調概念的歷史分析，將政治思想史當作是意識型態或概念史。由此可知 Skinner 的理論確實為政治理論研究開創了一個新的境界。

- Ayer, Alfred Jules (1936)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0.
- Baldwin, Thomas (2001)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Philosophy in English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oor, David (1991)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lton, Geoffrey (1969a)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rev. edn. London: Collins.
- Elton, Geoffrey (1970) *Political Histor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London: Penguin.
- Graham, Keith (1988) 'How Do Illocutionary Descriptions Explain?',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Cambridge: Polity. pp: 147-155.
- Gray, John (1989) *Liberalisms: Essay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 Gray, John (2000)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New York: New Press.
- Grice, H. P. (1957) 'Meaning', in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66, No. 3, pp: 377-388.
- Hollis, Martin (1988) 'Say It With Flower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Cambridge: Polity, pp: 135-146.
- Laslett, Peter (1960) 'Introduction', in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oore, George Edward (1902) *Principia Eth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Moore, George Edward (1903) '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 in *Mind*, Vol. 12.
- Palonen, Kari (2003)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Cambridge: Polity.
- Pocock, John G. A. (1962)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cond Series, ed. Peter Laslett and W. G. Runciman. Oxford: Blackwell, 183-202.
- Rorty, Richard (1979)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rty, Richard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ssell, Bertrand (1905) 'On Denoting'. Reprinted in R. C. Marsh, ed., *Logic and Knowledg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56.
- Skinner, Quentin (1969) 'Meaning and Context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History and Theory*, Vol. 8, pp: 3-53. Abbreviated and revised version in Skinner 2002, pp. 57-89.
- Skinner, Quentin (1970) 'Convention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20, No. 79, pp: 118-138.
- Skinner, Quentin (1972a) "'Social Meaning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4th Series, ed. Peter Laslett, W. G. Runciman and Quentin Skinner. Abbreviated and Revised in Skinner 2002, pp: 128-144.
- Skinner, Quentin (1972b)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exts',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 pp. 393-408. Revised and fused with his 'From Hume's Intentions to Deconstruction and Back',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4, pp: 142-154, and titled 'Motives, Inten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in Skinner 2002, pp: 68-78.
- Skinner, Quentin (1988)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Cambridge: Polity. Revised version in two parts entitled 'Interpretation, Rationality and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in Skinner 2002, pp: 27-56, 103-127.
- Skinner, Quentin (2002) 'The Practice of History and the Cult of the Fact', in his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1,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8-26.
- Strawson, Peter (1964) 'Intention and Convention in Speech Act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73, No. 4, pp: 439-460.
- Wittgenstein, Ludwig (1921)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
- Wittgenstein, Ludwig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 Wittgenstein, Ludwig (1984) *Culture and Valu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高宣揚 (1991) 《羅素哲學概論》。台北：遠流。